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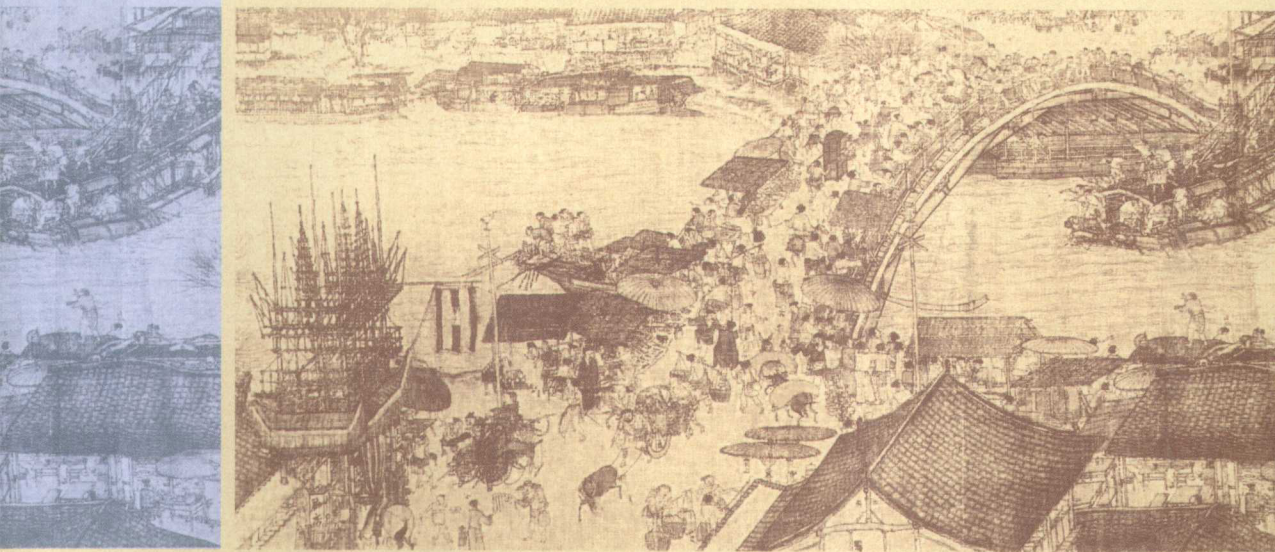
张家驹史学文存

张家驹 | 著

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

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

张家驹史学论稿



张家驹史学文存

张家驹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张家驹史学文存/张家驹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208 - 08933 - 4

I. 张... II. 张... III. 史学—中国—文集 IV. K2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5158 号

责任编辑 周 珍

封面设计 储 平

技术编辑 伍贻晴

张家驹史学文存

张家驹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4.75 插页 4 字数 680,000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933 - 4/K · 1614

定价 70.00 元

前言

虞云国

我就读上海师范大学时，张家驹先生已经去世四年，当时也不知道其人其书。我学宋史，追随的是程应镠先生，从先生那里才听说张荫麟与张家驹的大名。据先生说，他在西南联大听张荫麟的宋史课时，开出的参考书只有《宋史纪事本末》。那是1938年的事，由此也可见当时宋史研究草创未备。程先生还说，他对宋史缺乏全面研究，只是校点了《宋史》，材料熟悉些；已故的张家驹先生才是宋史专家。也许受到指点，大学一二年级，我阅读了所能找到的张家驹著作：《赵匡胤传》、《沈括》与《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尤其是第三本书，视野的开阔，史料的翔实，给一个宋史初入门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不仅关系到对中国经济史的总体把握，也影响到政治史、社会史与文化史诸多领域，堪称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在张家驹之前，虽有学者对南北经济嬗变消长做过零星的探索（其中较著名的日本学者为桑原鹭藏与加藤繁，中国学者则有丁文江、谭其骧与全汉升等），但将这些不成系统的关注提炼为一个关系中国史全局的重要命题，并给出全方位论证的，张家驹功莫大焉。

001

从燕京大学高年级起，张家驹就涉足这一问题。1942年岁末，他自述道：“此七八年来，对于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迁转之史的研究，颇饶兴味。”这一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就是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宋代东南之繁盛》。这篇论文的具体内容不得而详，他在193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与《宋室南渡后的南方都市》等文章，或许与此有关。

1936年，张家驹中止了在燕京大学研究院的学习，南下故乡广州谋职，其研究却并未中辍，“积久而卡片愈众”。但不久抗战爆发，他也辗转播迁，积累的资料“多所散佚”。1938年，他流寓香港，重搜史料，“始复旧观”。次年岁杪，他着手撰著《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至明年春，草就上篇。1939年岁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随之沦陷，他继续在“火线之下，潜心工作”。他自述其情其景说：“维时炮轰之声，晨昏不绝，作者蛰伏斗室，如若无闻，自念生命危于顷刻，益觉时光之可贵。”这种不惜以生命写历史的精神，让人想起中国史家“史不可灭”的古训，也让人想起数学家高斯在拿破仑围城时研究不辍的执著精神。1942年3月，他“逃难故乡，续成最后两章”。而战祸却使他的“所有卡片，悉数牺牲”。

孰料业已完稿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依旧命运多舛。张家驹先以初稿自珍，

后来屡经删易，最后考虑免遭兵火之灾，才决定由人介绍正式付印。然而，负责印行的协荣印书馆只印出半部书稿即告倒闭，在1944年草草装订行世。如今，这存世的半部原版本也颇罕见，唯在《民国丛书》第5辑中尚能一睹其貌，目录上标明《上篇——沿革考》，下篇却就此不知所终。

对这半部《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1949年以后，张家驹在多次填写的履历表上从不提及，直到他为1957年版《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写《后记》时，依旧讳莫如深，好似浑无此事。据与其共事的李培栋教授推断，主要原因也许“书是在沦陷区出版的，他认为不光彩”，而他又在沦陷区警察局供职过半年，历次政治审查与1957年的反右，让他对此噤若寒蝉。而实际上，张家驹对这半部著作，却是相当看重的。这次为出版《张家驹史学文存》，笔者前往国家图书馆查对原书缩微胶卷，见其上有他1946年9月5日的亲笔题笺：“国立北平图书馆惠存 作者持赠”，这一持赠本应是他在广州亲自邮寄的，足见他还是希望这半部书传之后世的。

二

002

在这半部《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中，张家驹借鉴了人文地理学、文化学与社会史的方法与视野，对自己所研究的课题确立了一个主导性思想：

民族国家之发展，文化随而扩充；混合同化之结果，社会中心亦因以转移。盖每一次迁徙或扩张，势必促成新旧民族之接触。结果必使在文化上一面受原有居民之影响；一面则胜者及其文化，终为土著所吸收，其行甚缓，厥功甚伟。（页5）

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他对中国历史上社会中心的转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约分析之，以为三期：（一）自上古以迄西晋，北方实为根本，衣冠人物之所萃；南方鄙野，形势悬殊，三千年来，可称为北方中心时代。（二）及至五胡大入，中枢南移，以至北宋之末，经营垂八百年，筭路蓝缕，始克相颌，是可为文化统一时代。（三）降及近世，八百余载，中原屡劫，鼎祚数迁，南方以成首要，富盛无伦；北方衰老，迥相判别，至是可称为南方中心时代。（页6）

这一分期，在《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概括为北方的全盛时代、南北对立时代与南方的全盛时代，但分期坐标点与基本特性却是一以贯之的。

在这半部残书中，张家驹认为，在中国社会中心的南移过程中，永嘉南渡与安史之乱是两个关键性的转捩。由于前者，东晋南朝的两百七十一年间，“汉族文化之播迁，以及南方物质之建设，经时既久，成绩昭著。中国文化中心南移，斯为一大枢纽”（页34）。而“安史之乱，不特有唐一代盛衰之枢纽，抑亦吾国史上社会文化之一大转捩也。吾文以北宋南渡至近代划为南方极盛期。实则此极盛期之开端，早轫于此，至南宋乃

臻成熟耳。”(页 67)《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重申了这些基本论点,并结合两宋历史把靖康之变与紧随其后的宋室南渡作为中国社会中心南移最终完成的历史坐标。可以推断,这些原来应该是他在亡佚的后半部书中展开的内容。因此,张家驹关于中国社会中心南移的总体思路与系统观点,在其 1942 年完稿、1944 年出版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中已经完形。

现在看来,张家驹对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说的总体研究思路十分明晰。他在 1942 年完成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只是一个初稿,据该书《弁言》说:“将来战局救平,得集大雅之海,以正纰缪。然后遍历南北,博览群籍;纵游江湖,搜访遗迹。补之定之,期于异日。而全部之《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迁转史》,亦冀可得以问世。”可见,他立志撰述的是《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迁转史》,《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只是宋代以前部分,即便这一部分,他还准备通过“博览群籍”与“搜访遗迹”,即从文献史料与实物史料两方面予以充实完善,然后补足元代以后部分,最终完成他构想中完整的《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迁转史》。然而,造化弄人,张家驹没有料到,他所付印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却残损了半部,现存《沿革篇》的内容仅包括五代以前部分,宋代部分已经亡佚。他在 1957 年出版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实际上是在补写那业已亡佚的半部书。

对照张家驹自拟的三部书名,四十年代分别是《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与《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迁转史》,五十年代则是《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作为关键词,“南移”与“南迁”差别还不大,而“社会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区别还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中心”具有社会史的丰富内涵,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都包括其内;而“经济重心”则侧重于经济基础的层面。尽管在《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里,张家驹并没有局限于经济,还是兼顾到人材、文化等层面,但书名中关键词的改变,应该与 1949 年以后将社会学与社会史划为资产阶级学术流派息息相关,张家驹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惟其如此,时至今日,我们不妨恢复他对这一论题的原先命名,称之为“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庶几更切合其初衷与真意。

三

1949 年以后,作者自己遮蔽半部《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尚属事出有因。但令人不解的是,许多这一专题的学术史回顾,也往往只提他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却只字不提他在四十年代出版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例如,郑学檬在其《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的《后记》中指出:“自从张家驹先生《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一书出版(1957 年)以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引起史学界的注意,讨论渐次展开”。《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中的《宋史研究》也说:“50 年代,‘经济重心南移说’在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得到充分的阐述”,并说其“资料

的收集主要在1938年至1941年间,1955年才开始写作这本书”。看来,《宋史研究》作者也不知道张家驹早在1942年就写出了《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这也许与该书印数有限流播不广有关。即便《民国丛书》收有此书影印本,仍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以至迄今为止不少宋史学者都还误认为此书就是《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的民国旧版。

对张家驹“社会中心迁转说”的隔膜还不止此。《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的核心论题认为:

两宋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统一帝国的重建,构成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时代,也是我国经济重心完成其南移行程的时代。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我国社会就完全进入南盛北衰的新阶段,因此,这一历史事件,就成为我国南部发展历史中的划时代关键。(页107)

尽管这一结论持之有故,却横遭某位同行的严厉批判,批判者指责“这本书在观点上是有错误的”,说张家驹主张“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是“把历史的发展几乎完全归功于封建统治者”。在批判者看来,“宋王朝的南渡,政治中心的南移并不是我国南部经济发展历史中的划时代关键,划时代的关键在于农民起义”。稍有常识者都明白,张家驹在这里标举的“宋王朝的南渡”,只是一个年代学的标志性事件;即便如批判者的理解,在南渡的宋王朝里,不也包括那些被统治者吗?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批判,十足折射出那个年代中史学所面临的荒唐与困惑。

当然,今日史学界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还是给予高度评价的:

这是一部跨越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多领域的研究专著。……张家驹此说得到史学界的重视。各断代史研究者纷纷加以论证,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后大致形成“南移”完成于南北朝、隋、唐、北宋等几种不同意见,大部分学者认同张家驹的说法。(《宋史研究》)

也就是说,其后无论是补正完善张家驹之说的(例如郑学檬的《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还是对张家驹之说提出异议的(例如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与《中国北方经济史》),或者从社会、文化诸层面对“南移说”进行深化与拓展性考察的(例如吴松弟的《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的变迁》与《中国移民史·宋辽金元时期》,程民生的《宋代地域文化》),无一不是在张家驹“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的示范与启发下,开展他们研究的。倘若借用西方科学哲学中库恩的“范式”理论,“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这一中国史研究中的“范式”是由张家驹创立的,其后的研究都是对这一范式的补充与展开。张家驹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与宋史研究中的开创性地位也由此而不可撼动。

四

有理由推断,1957年以后,张家驹始终揣着整部《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迁转史》的念想,希望能够最终完成对南宋以后元明清三代南方中心时代的研究。可惜,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总是打断他的学术研究,而他最终也在十年浩劫中不幸去世。前引《宋史研究》在列举宋史学创立期“有添砖加瓦之功的学者”中提到了张家驹,还说“有的专研宋史,但天不假年,无法做出更大的贡献,令人惋惜”,指的似乎就是张家驹。张家驹去世时,年仅六十岁,确实天不假年。但即便就其传世论著而言,他已经无愧为宋史学创立期的主要拓荒者之一,他的“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与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说”(代表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1936年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足以并称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里最具问题意识的两大命题,这样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我无缘亲炙张家驹先生,却从他的著作里了解了他的学术。在我供职的学院里,走廊上挂着本校三位史学前辈的照片:业师程应镠先生、中国近代史专家魏建猷先生与宋史专家张家驹先生。每次走过张先生的照片,总感到与他有着某种无形的联系。这种联系,也许就是后代学子与先行者在进行绵延不断的心智对话。倘若重温半个世纪前他在《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中的结束语:

今后我国人民,完全具有充分力量来利用与改造自然,开发经济落后地区,达到全国经济平衡发展和均等分布,迅速促进生产力发展,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经济生活。(页108)

再联系目前东部与中西部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巨大不平衡,你就会觉得张家驹通过自己的研究关注到“开发经济落后地区,达到全国经济平衡发展和均等分布”,不乏历史学家的先见之明,仿佛是立足当下在说这番话的。

我还联想到,张家驹出版《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残本时,年仅三十,而自己在那个年龄,刚进大学,还没有跨入史学之门,不由得低吁一声“惭愧”。张家驹最终职称只是副教授,环顾今日学界,那些不学无术或不学有术的博士生导师与学科带头人有如过江之鲫,不由得让人感叹学术进步确实今非昔比。于是,我愈加觉得有必要彰显这段被忽略乃至湮没的学术史,把《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介绍给读书界与学术界。

五

张家驹生前出版过五部专著,按年代顺序依次是《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1944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1955年)、《赵匡胤传》(1958年)、《黄道婆与上海棉纺织业》(1959年)与《沈括》(1962年),还发表过论文三十余篇。编辑出版《张家驹史学文

存》，理想的做法就是悉数收入以飨读者，但基于出版经费的考虑，仍不得不有所割爱，略作汰选。斟酌再三，为了凸显张家驹在“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上的开创性贡献，将《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残本）与《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作为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衔接的两种专著全书收入《文存》，而将其从未结集的单篇论文辑为《张家驹史学论稿》作为《文存》第三种。

《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依据的上海书店出版的《民国丛书》第5辑中的影印本，该影印本没有版权页，却在扉页上标明“本书据商务印书馆影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七十六年史学书目》著录该书为商务印书馆1942年出版，或许就是《民国丛书》本的根据所在。但这个影印本字迹模糊，很多字句无法卒读，给整理出版带来了极大困难。于是，便试图在上海各高校图书馆找寻《民国丛书》所据底本，却遍觅不得。无奈之下，我只能凭借专业知识，依赖上下文句，查阅相关文献，把猜测、查核乃至考证等手段都用上，才勉强让录入人员打出了初校样。然后，趁着赴京之机，带着初校样与《民国丛书》复印本到国家图书馆去复核底本的缩微胶卷，放大辨认，目轮火爆，才把文本讹讹率降到最低。缩微胶卷也没有版权页，只在首页标明：【广州】：【协荣印书馆】，【1944】。由此可知，该书正式出版应在1944年，《七十六年史学书目》之所以著录为1942年出版，或许是根据该书《弁言》“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作者自记”的落款，但说该书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何最终却由协荣印书馆印行，两者关系如何，至今说不清楚。至于《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所据的是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张家驹史学论稿》收入正文29篇，其中仅有两篇为生前未刊稿，其他都正式刊出过；附录3篇，则附在相同论题的论文之后作为参考比照之用。大体分为六辑。第一辑五篇属于宋代政治史范围，其中《论南宋的忠义巡社》与《“乾淳之治”与农民起义》据未刊手稿付排。第二辑五篇属于“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的前期论文。第三辑五篇属于宋代经济史范畴；两篇同名的《黄道婆和上海棉纺织业》，正文所收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专著，附录一篇则是论文。第四辑五篇则属于宋代科技史领域，其中关于沈括的四篇，第一篇具有总论性质，后三篇节录自《沈括》一书，基本体现了张家驹对沈括研究的主要成果。第5辑四篇是无法归入以上类别的宋代研究的论文，有文献考证的，也有对外关系的，还有关于宋代历史剧与宋辽夏金元史教学的。第6辑五篇则是宋史以外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其他论文，其中《论海瑞的评价不宜过高》，是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他被要求写的论文，收入《文存》旨在保存那段历史的一个断片，但作了必要的技术性处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一个阴谋，仍将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在讨论，既说明了与吴晗的“分歧所在”，也表明了与姚文元“主张不同的地方”。

在整理《张家驹史学文存》时,整理者对原作者注释不规范处在体例上进行了适当的统一;但对其所注书籍的版本则不予补足,因为已难确知他所使用的版本。行文中明显的讹脱衍倒,整理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了补正删乙,但外文译名不按当今惯例改正。标点符号的使用,在不影响文义的前提下做了规范化的处理。作者个别的史料错误,在改正同时以整理者按语的方式加以说明。

作为《文存》附录的两篇文章,有助于了解张家驹其人其学。程应镠先生的短文《一位为人师表的学者》以知友的身份对其人格风采做了素描式的勾画。李培栋教授则在《宋史学家张家驹传》里,对其学术生涯与史学成就做了全面的评述。

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与王化雨博士代为寻访并摄制了张家驹《宋代造船工业之地理分布》的照相文档;国家图书馆王茵研究员为查阅《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的缩微文本提供了方便。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提供了张家驹的专著与绝大部分论文的底本,孙旭博士则在查找并复制方面付出了具体的劳动。没有上海人民出版社专题编辑室主任许仲毅先生的鼎力襄助与责编周珍女士的辛勤编校,《文存》的顺利问世也是绝无可能的。最后,还要感谢张文飙先生代表作者家属在著作权上的热情支持与大力合作。这部《张家驹史学文存》不仅足以让他们为先人而自豪,也足以让他们告慰先人。在筹划《文存》出版事务中,李培栋教授与著者家属多方接洽,出力最多。而我,也能为张家驹学术的薪火相传贡献绵薄之力而颇觉欣慰。

总 目

前言	001
一、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	001
二、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	105
三、张家驹史学论稿	209
附录：	
1. 一位为人师表的学者——纪念张家驹同志逝世十周年 程应镠	526
2. 宋史学家张家驹传 李培栋	528

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

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



弁 言

002

王鸣盛尝言：“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十七史商榷·序》）作者读之有感，久之不敢妄谈撰述。第此七八年来，对于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转迁之史的研究，颇饶兴味。读书有得，便即札录；或有所见，笔之卡片。间或草为三数短文，发表国内杂志，不敢自谓著述，迨所以就正于贤明。然自此颇得先严暨师友之鼓励，积久而卡片愈众，亦不敢有意于著述也。俄值战事发生，作者展转播迁，数易居处，断篇零简，多所散佚。迨后流寓香港，生活安定，渐次增补，始复旧观。又因地狭人稠，鼠子为患，一夜之间，被啮数四。遂于廿八年冬至翌年春间，草成本书上篇。欲使搜集之材料，连缀于篇，多一副本，冀以保存，只缘生活所系，未毕全功。客岁之冬，战氛弥漫港岛，时势之变化未已；既而果有城下之盟，作者几有绝粮之厄。转念交通恢复，亟须离境。然荷此卡片数箱，不特不便于旅囊，抑且道路检查，易滋疑窦。遂于火线之下，潜心工作，草成下篇，以为之续；两宋而后，未暇及焉。维时鏖战方酣，炮轰之声，晨昏不绝。作者蛰伏斗室，如若无闻。自念生命危于顷刻，益觉时光之可贵。因循两月，未竟而行。复于岁春三月，逃难故乡，续成最后两章，题之曰《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于是所有卡片，悉数牺牲。书成后，其初但以初稿自珍，不敢轻以示人。后来屡次删易，稍稍出以正诸友好，遂有以刊板为言者。考思至再，卒纳其议。盖战时行止靡常，旅途艰难，易于遗失。终恐汲汲经营之唯一手稿，不获遂偿初志，致使八年心力，耗于一旦。率尔刊布，惟图苟全。昔司马文正著作《通鉴》，首成《长编》。近今学者著述，亦多刊印初稿，分送亲知，以待删定。作者付印此书，亦不过窃师此意。将来战局敉平，得集大雅之海，以正纰谬。然后遍历南北，博览群籍；纵游江湖，搜访遗迹。补之定之，期于异日。而全部之《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转迁史》，亦冀可得以问世。因述作书镂板颠末如此，则其间读者容有若干不满之处，或可足供鉴谅。至希进而教之，以匡不逮。则所谓著多妄者，庶几其可或免欤？本书之成，多得诸师友直接间接予以指导及协助，于此略布谢意，并敬以此书纪念先严祥熙府君，追敬鞠育劬劳于万一。

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作者自记。

目 录

上篇 沿革考

第一章 绪论	005
地理环境支配历史	005
文化中心之嬗递	005
历史上之南北观	007
总论参考资料	010
第二章 上古秦汉中国社会	015
上古根据地黄河	015
周代南北社会	016
人材之比较	018
秦汉南方与北方	020
工商业与都市	021
人物之渊薮	023
人口之转徙	025
郡县官吏开辟地方	028
秦汉时代之四川	029
魏吴蜀三个政治中心	030
结语	035
第三章 晋室东渡与南方之开发	037
三国局面之延长	037
异族内侵破坏北方	038
人口大量南移	040
人物之渡江	042
渡江后农工业之比较	044
建业及其他都市	047
开发岭南	051
北方都会仍甚发达	052
佛教之南传	054
南北人士互有长短	056

学术文艺之发展	057
结语	066
第四章 隋唐五代东南之富盛	068
助长东南开发之两大因素：运河之开辟与安史之乱.....	068
东南农工商业之发展	075
社会生活之豪侈	085
开发岭南	087
地方官吏开发南方	089
南方人物亦渐富盛	089
学术文艺之发达	090
四川亦为唐代经济中心	092
五代北方农村崩溃	093
江南诸国之社会文化	094
西蜀之文物	100
结语	101

上篇 沿革考

第一章 绪 论

地理环境支配历史 支配一地文化之发展,其要素有二:一曰地理环境;一曰社会环境。地面为社会成立之基础,故于人类社会之发展,有莫大之关系。社会学者,于是倡为《地理环境说》(The Geographic-environment Theory),藉以诠释社会变迁之原。若白克尔(Buckle),森柏尔(Semple),汉廷顿(Huntington)辈,皆其俦也。夫历史既为人类赓续活动之累积,则历史之开端及其发展,要不外二者之交相互作用使然。法人邵可倡(Elisee Reclus)氏,即谓历史为地理之因人与人继续不断之反应作用累积而成^①,英人斐格莱(James Fairgrieve),亦主历史之变迁,出于地理条件支配之结果^②。不过地理环境,并非处于完全支配之地位。论其影响,在人类文化幼稚时代,力量至大;反之,文化愈进步,人类控制自然之能力愈大,则其力愈小,其理至明。且人类不仅调适环境以求生存而已,其势必趋于寻求更优越之调适;更优越之生存,然后社会始有进步。是故一地方之文化,遇有地理上之缺憾,或社会需求之日繁,则人类为求更优之生存计,或积极的予以改良,或消极的转移或扩充其地位。历史上民族之转徙与混合,文化中心之嬗递,疆域之展拓,商业之往来,莫不循此轨辙,交相兴谢。然则社会因地理条件而变迁,地理亦因社会之变迁而改易,与互为因果者矣。

005

文化中心之嬗递 社会中心转迁者,社会变迁现象之一也。人类社会现象,自始即常在变动中。此种变动,或起于人口,或起于文化。后者尤为社会成立之基本要素,人类之社会行为,无非在文化中活动而已。若进而究此变动之由来,实不外发明与传播两端。传播者,一种文化,由一文化区域传至另一文化区域之谓。盖文化极赋传染性,不与外界接触则已,一经接触,便有传播之可能。其传播之方向,若无外力阻止,当由内部传向外方,由原发明地向外渐渐广播,此原发明地者,即所谓文化中心是。是故文化传播之倾向,初由原中心地传至次中心地,如是而逐渐推广焉。伸言之,文化中心之转迁,涵义有两:一为旧中心之改变,一为新中心之产生。此种转移,或基于地理环境之差异:原发明地文化之产生,原自有其超卓之条件,历时既久,社会变迁,其地缺憾,往往自然流露,如气候之不良,地形之狭隘,此种弊窳,殊非人力所能补足。复因人类控制自然能力之增进,其与外间接触之机会自多,一经发觉较优之地位时,人类之天

① 见郑绍文译《人与地》(L. Homme et. la Terre)。

② 见张富康译《地理与世界霸权》(Geography and the World Power)。

性，恒舍此而就彼焉。或基于地理环境之变化，如水、旱、风、震诸灾害，常使社会秩序，不能维持其原有之均衡，其中心之价值，亦渐次消失。此消极的限制，生于自然环境者也。而又益以社会环境之变迁与极有组织的文化传播，前者如人口之增加，物质需求之渐广，政治之不良，战争之破坏等等；后者如远征、传教、殖民，以及一切政治、文化侵略诸事象；皆为促进社会中心转迁之由来。至其变迁之动向，恒循一定之途径焉。此途径者，即斐氏所谓“地理条件给予保护，且能支配人民取得能力之方向，一方面决定阻力最小之路向；一方面藉影响于人类心理，使之决定初似艰难但就全局言为较易之途径”是也。故“人类不仅居于生活较易之地，即有较多能力可用之地，且向流动最易之方向，即行动时所费能力最寡之方向而迁徙”^①。直至遇及或种天然障碍，或竟为他种民族相反方向之扩张阻止而后已。历史之进步，概皆沿此法则。

寓北半球之诸族，居处愈北，冰寒愈剧；内陆燥旱，生物不蕃；为温暖湿润之气候所诱饵，辄有自北而南之趋向。雅里安族之入据旁遮普平原，北美两洋沿岸印第安人之南下建国；与夫中国历史之由西北而东南，莫不皆是。民族国家之发展，文化随而扩充，混合同化之结果，社会中心亦因以转移。盖每一次迁徙或扩张，势必促成新旧民族之接触。结果必使在文化上一面受原有居民之影响；一面则胜者及其文化，终为土著所吸收，其行虽缓，厥功弥伟。从地理环境言，吾国疆土，东西占经度约六十四度余，南北占纬度约四十五，面积浩广。西部帕米尔高原，为群山之总汇。康、藏、蒙、新一带，尽属高原。西部台地，尤多六七千公尺之高山，山巅积雪，永年不化。高地沿边，逐渐低陷，或为盆地，或为高原，或为坡地，或为山丘，起伏纷歧，综错不一。再东始为平原，地势缓坦。若松辽、黄淮、吴越、粤江诸平原，皆在二百公尺以下。是故沿海之域，低洼敞平；距海愈西，愈形高峻。换言之，吾国崇岭高原，皆在西北；平原低地，偏处东南。高原倾斜既急，交通梗隔，不宜人居，不适耕种。平原则河川沼泽，交灌田畴，地味肥沃，物产丰富，此地形之大较也。至若气候迥殊，亦良重要。吾国极南，距赤道不过八度余，极北将至五十四度，域内气候，复杂异常。大抵愈往北方，愈益寒冷。其季候风向，夏则东南，冬则西北。自南至北，大山横亘，如秦岭，如南岭，皆足以气候之障壁。于是愈往内陆，愈益干燥。是以东南一带，温和湿润；西北区域，寒暑剧差。此气候之大别也。若夫土壤分布，亦南北互殊：北方多属黄土，虽号肥沃，而性质疏松，易于渗水；水分稍缺，便成贫瘠。南方多为红土，其冲积之地，土质细致，如长江、珠江三角洲，皆极肥美。沿淮河西至秦岭，乃其分界也。夷考吾国初期文化，初始黄河流域。西域流沙，广漠难涉；北际漠南，凜冽难越；

① 见张富康译《地理与世界霸权》(Geography and the World Power)。